

幫會的解析：

芝加哥1313個幫會的研究

本文譯自 R.R. Korn 編的 *Juvenile Delinquency* 一書的第二篇文章 (PP38-77)，Frederic M. Thrasher 所著的 *The Gang*; 1968, N.Y.: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一、緒言

在一個精緻的觀察者手中，幫會提供了一個獨創性精緻隱喻 (metaphor) 的古典例子。此隱喻是一個生態學的概念，它原為植物生物學的本有名詞。在它被導入於社會學且經異域觀念仔細地難交精製後，已經生產出一個無窮盡新頓悟的真實園地。而這些頓悟的發展和使用，明顯地是屬於美國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偉大工作——即芝加哥學派，而崔斯 (Thrasher) 可說是此學派中值得吾人稱讚的一個人。

從達爾文 (Darwin) 和派克 (Robert E. Park) (一個芝加哥學派的創立者) 的基本前題中，吾人知道人像植物一樣，是繼續不斷地牽涉到為生活必需而生的競爭奮鬥的漩渦中，而此奮鬥的最初展現，則表現於生存空間的競爭。假如此隱喻是妥當的，那麼此奮鬥的象徵必然會在人類生存空間中得到證明，即與競爭植物種屬間的奮鬥而生的地球上植物消長模式有相同的形式；而在人類競爭中最擁擠的集中地就是都市。在仔細檢查都市社區後，吾人可能在人們居住的不同鄰里地區裏，看到人類奮鬥證據的痕跡。人類生活的自然條件之成長和衰退，被期待能反應，或反應出社會組織的生長和破壞；而那些組織，則反過來，將在人際關係的變遷模式上反應出來。

社會生態學家是其中第一個認識到，他們已正確地使用他們的自然隱喻的學者。除開為了某些一般目的外，一個人並不是僅僅生活於其生存的自然

棲息地。從大多數實用目的而言，一個人的有效環境，必須以對他是有意義事件的世界來界定之。在此區域內的條件，如對其不产生影响，則可視之為外在世界；即使像幫會孩童從不進入的鄰里娛樂中心，雖然它距離很近，也應視之為外在世界。

原始隱喻的不斷精鍊，可在幫會 (The Gang) 一書中得到證明。有時此種轉換造成了某些變形，就如當崔斯企圖把地形學上的空隙地 (interstitial area) 概念，變成為社會學味道時所碰到的。一樣。

本質上而言，外國事物有向核心集中的傾向，從而才能充滿了每一處空隙。在社會組織的結構中，也有如此的空隙，是故幫會可以被視為是社會架構的填充物，而幫會區域 (Gangland) 則可視為是都市地面區位的空隙區域。

在此書中的後段，崔斯則直接地討論了許多幫會行為的人際糾葛。而原始犯罪區域概念的漸增社會學味道，也出現在其社會角色和親密區域的討論中。

個人取向區域，可以用地理區和情感區兩者來界定之。就幫會孩童而言，他們有包括家庭和家鄉疆界的地理區，超越此範圍，則為敵人區和外在世界。此外他們尚有一個親密區，在其中他有很近的感情互賴關係……幫會成員被那些情感契約所吸收，從而基於交感的關係於是成立……這是一個非常親密的地區。

從他的親密區的輻輳和分離的檢驗中，崔斯對於法國社會學者達爾德 (Gabriel Tardo) 在許多

年以前曾經注意到的：『大多數自命爲正常的孩童，將易於受到圍繞於其周圍的具有半吊邪惡記錄的朋友之影響，超過於受到百萬陌生公民之影響是可能的。』可見提供了可能的旁證。

崔斯把貧民區孩童的犯罪，連繫於他們頹廢的生存條件之貢獻，可能比他對於他所提的下一個問題的答案，即首先引起那些條件的原因是什麼的問題之答案，更爲出色。從而把那些原因歸咎於家庭生活失調、學校失效率、宗教的形式主義和拘泥虛禮、政治的腐化和冷漠、低薪資和未就業等，崔斯已指出超出貧民窟以外的世界，去尋求原因的線索。

他的分析之言外之意，破壞了吾人通常所想的處置偏差問題，只要有操縱這些偏差者的計劃即足的想法。假如使貧民和偏差者痛苦的最終頹廢源泉要在富足和從衆的活動中發現之時，那麼只與社會失敗有關的社會計劃之任何部分，是不能達到此問題的根源。因而此問題已變爲，不僅是誰來改正偏差者，同時也是誰來改正從衆者的問題。

民族聚居區 (Ghetto) 的小孩和青年，如何藉着變成爲英雄，以及暴力殉難者和大眾異議運動，來尋求使自己退出此類廢場的醒目手段，也將在此書中的最後兩個部分加以研究。

一、結幫 (Ganging)

研究幫會起源的地區，最好的是都市中的貧民窟。在那裏，非常多的小孩擁擠在有限的地區上，

每一個暖的和黃昏，小孩羣集於通道、人行道、空屋、骯髒地方、街道和巷道。那種嗡嗡的格咕聲和持續不斷的活動，使人想起他們就像一羣羣集徘徊的昆蟲，迄今仍然不停地在熱鬧的羣衆中到處疾走。此種無窮盡的活動，有其驚人的魅力，甚至對於到此處的偶然訪問者而言，也是如此；的確，假如任何健康的小孩，能够使自己脫離它，他將是一個非凡人物。

在這裏，小孩羣集和自生的遊戲團體，便遍地形成，它可說是幫會的胚芽。此種擁擠環境裏，充滿着某些屬於或不屬於幫會社會自身環境的敵對個人或團體之間的衝突機會。衝突，一方面來自於團體本身的階級，對於有價值的幫會地區的特權——疆域、贓物、遊樂地、不法事業的保護和剝削特權等——之競爭；另一方面，它則透過對於一般社會秩序的反對，而變成爲無監督的幫會活動。以致幫會面臨了，爲了應付其他幫會和外在社會環境的反對力量而產生的真實生存奮鬥。

遊戲團體易於碰到此類的仇視力量，它給予成員我羣的感覺，從而開始了這些無組織區域的結幫過程之生活特性。

在五月的某一個晴朗的日子裏，我們到 Hull-House 地區訪問，街道和空地充滿了小孩，在很少的指導下，他們從事着各類活躍的遊戲。

在 Goodrich 學校操場的一邊，Peorias (未來某些幫會的核心基礎) 正在從事一種遊戲球配隊的配隊技術之遊戲，而其追隨團體年輕的 Peoria Strangers 則在一邊觀看。在圍場的毗鄰地區，

Tanners 在賭一局 \$3.75 元的 Forquer 的遊戲，而 \$3.75 元賭金乃因敵對團體的刺激而促成；當裁判作了一次劣等的裁判後，一場打架才剛剛避過，但孩童却用一種威脅的姿態羣集於裁判四週，同時在場地的另一端則有超出兩隊以上的團體也在作着遊戲。

全部的小團體都參加談話，或作枝節的遊戲。不遠，則有一個成人與四、五個青少年毫不隱匿其金錢地玩着 Runmie 遊戲。巷道的打架使得雞飛狗跳，於是突然間，全場的人羣湧至圍牆，以便瞭解發生了什麼事。

在 Blueland 和 Forquers 的角落，我們發現 L Rivers 和 Red oaks 的第二隊 loogins 正在玩精彩的球賽，而第一隊則精力充沛地爲其黨派坐鎮。小小孩的幫會在巷道升起了營火，玩着印第安遊戲；他們迷人的動作，給與我們一種夢幻冒險世界的想法，而它是幫會小孩經常嚮往的世界。

穿過 Halsied 到達 Forquer，我們看到 orioles 正在建築物的牆上玩着手球的遊戲，雖然他們在閃避技術上已大有發展，但却因汽車和行人的干擾而受到很多的困難。在 Dore 校園地，Guardian Angel Alley 也在玩着相同的手球遊戲。穿過牆洞後，我們又碰到 Arabian Nights, Taylors 和 Cones 等。他們已作完遊戲，正在唱着他們的勝利讚美曲，就像大學所唱的加油歌 (pep songs) 一樣。

在回程中，我們遇到 Black Cricles 和 Polk Halsied 的角落遊戲。我們最後的一站是 Red

oaks 的俱樂部，它是由一老組織所購買和裝備而成的新地社會和體育俱樂部，在其內，成員們安靜地坐着玩牌和談話。

三、幫會與遊戲團體

在那裏，遊戲團體和幫會各有其清晰的地理根據地。

在都市裏較為擁擠的地段，幫會的地理根據地是，同一條街兩邊距離兩個 Block（由二條直街和二條橫街所圍成的區域）的範圍。孩童成員經常玩在一起，而其父母親則是此區域內的熟人，並且在漫長的仲夏之夜，也相互坐在門前聊天。不但成員相互間都認識，同時其兄弟姐妹間也相識，而且當他們長大後，仍然在一起遊戲。有一些調查指出，在學校放學後，成羣在校園遊戲的兒童，雖然也包括鄰近地區住家的孩童，但其中有很多孩童在日間並不就讀於此學校，因而學校可說不是此類幫會的構成基礎。

在較不擁擠的地段，因有公園可資利用，遊戲團體通常是居住在半徑幾個 Block 地區的小孩，整個團體只是把他們自己由鄰里地區移居於公園內。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空地上的遊戲團體，他們全部是來自於附近街道的孩童。一個人可能看到，一個來自同一地段團體，在與來自另一地段的團體互相玩對抗的遊戲，但其中每一隊的成員，卻沒有來自不同地段的份子。從小長大後，那些遊戲團體和幫會的成員仍然在一起；假如他們在另一個團

體中遊戲時，他們將處於一種非自然的氣氛。

多數的幫會便是由這種自生的遊戲團體發展而成。只要某一 Block 或鄰里的小孩或大傢伙爲了某種專業或娛樂而聚集在一起時，則僅是個人集合意義的羣衆便形成了。

一個新的撞球場在鄰里地區出現，對於小孩而言，是具有吸引力的。當團體發展於，針對住在對街角落擁有一家水果店的兩個希臘人的敵意後，幫會開始出現。孩童開始小量地偷竊水果，最後他們嚐試帶走放在走廊的大量橘子和香蕉，而希臘人追趕了他們。這是一般攻擊符號，而水果却變成了彈藥。幫會在此插曲中，已有了好的開始。

基於興趣和性向的基礎，一個遊戲團體出現了，從捉迷藏到賭雙骰子的全套活動。

有一個大約九個小孩的團體，他們的年齡介於十六歲到二十歲之間。他們是新教和天主教徒，有些尚在學，有些已經在工作。成員的聚會所是成員之一的住宅前面的房間。因那一成員的母親叫莎拉者，准許孩子自由地使用她的房子；成員中有兩個人是鋼琴演奏者。他們唱歌、蹦跳、打牌或僅是談話。此團體並沒有正式的組織，沒有任何人被認爲是領袖，但一個或兩個人的話，却有其比其他人重要的趨勢。此團體具有團體意識，成員的希望是羣集在一起，然而外界並沒有敵人，也沒有闖入者。很久以來此團體一直沒有新進者，後來因爲團體成員長大後，或移居或結婚，此團體才解體。

此類團體可能獲得真正的組織，即自然領袖的出現，相對地位分派於不同的成員身上，以及發展

其傳統。然而它並不會形成幫會，除非它已開始激起不贊成或反對的情感，並因而促成了更清晰的團體意識。假如他們發現了敵人，或在下一個 Block 的幫會中出現了敵人；或是他們的棒球或足球隊與其他團隊發生爭執；或父母親或鄰居，對他們懷疑或敵視；或是老人充塞於街角；或是被店東或警察所追趕；或是社區代表干涉或企圖解散他們等等事件時，則幫會才開始真正形成，從此它使成員更加接近在一起，它變成了衝突團體。

然而，假如吾人立即地假設，幫會是從 Jove 對面的一般街道羣衆如 Minerva Fulgown 成長而成時，則是錯誤的。幫會的形成是，以某些興趣爲基礎，發展成的相識和親密關係而開始的。但這些預備枷鎖，只能在孩童間作兩人或三人結合的功能，而不是把他們結合成一個團體。所謂的兩人幫，常是幫會的中心，而其他的孩童則受其吸引，從而形成了衛星的形式，因此幫會可能是由兩人或三人，以及單人的添增而形成。

「我們的幫會，是從住於相同 Block，透過通常的戶外遊戲而相熟的九個孩童的遊戲團體成長而成的，然後我們開始在 Tomney 的閣樓聚會。爲了高度私秘性，我們在巷口處建立了一個木屋，在那裏我們能夠不受受到父母的干涉，而得以暫時地孤立我們自己，並抽我們的煙。當我們的父母不在時，我們利用地下室做爲聚會場所，但我們必須小心地從窗口爬入，以避免房屋管理人的注意。」

「此種急欲逃避家庭監視的感覺，顯示出我們連帶感情的開始。我們的第一個忠誠表現在互相照

願，以對付我們的父母。有一個孩童的父母，非常不喜歡他，因而也非常地仇視我們。有一次當我們喊叫時，她向我們潑了一盆的洗碗水。

幫會首先是反對成員的家庭，其次反對鄰居。

某一個星期日早上，當我們在溝渠玩耍時，亞波太太叫來了警察，並告訴他們，我們破壞了她的財產。但結果只能證明我們輾過他的草地，警察笑了，並說她是太挑剔了，以致於不能過得很舒服。

不久，我們的集體事業，使得我們贏得了Cornell 羣衆的名字，但我們却比較喜歡稱呼我們爲Cornell 運動會社或C、A、C。在我們存在的六年間，我們只增加了兩個新的成員，但爲了他們兩人，我們却設計了一種特別の入會儀式，即要他們倆人模倣我們藉Tarkington 而從Penrod & Sam商店所表演一些特技的儀式。

我們的幫會，不論是在襲擊或球賽上，只要愈發生衝突，便愈來愈增大。在某一次與Harper幫會賽足球時，戰局的結果是，一場混戰後，我們終於打贏了他們。此後他們就對我們較友善，即使我們之間仍然繼續地相互襲擊彼此的巢窟。後來我們與Dorchester幫結盟以對抗Kenwoods幫，後者稱呼我們爲膽小者或有錢的傢伙。有一次當Kenwoods從Dorchester酒吧偷走一個火爐時，我們加入了逮捕行列，並追擊到第十五街把它拿回來。

來自其他幫會的危險，通常是足夠消除內部摩擦，並團結成員以對抗共同敵人。在某一年萬聖節之夜，我們成員中的兩個人打起架來，旁人始終無

法拉開他們，直到其他幫會成員到達，並用煤煙襲擊Tommie時，格鬥者立即忘却了他們的爭吵，共同幫助我們襲擊和對抗入侵的敵人。

四、幫會的本質

幫會可做爲，孩童爲創造他自己的社會的努力之代表，然而却沒有任何一個幫會能充分地滿足其生存需要。在成人社會控制的條件下，孩童從此結合，得到他們在其他地方不能得到的是什麼呢？那就是驚險和參與共同興趣的滋味。特別是在追趕、捉拿、衝突、打架和逃避等共同行動，以及與其他幫會的衝突和有關的世界，在在提供給他們許多刺激活動的場合。

風俗和制度對於兒童的經驗無法有效地起作用，而失敗於正常地對他們有指導和控制的情況，表示出家庭生活的不整合，學校的無效率，宗教的形式主義和繁文縟節，職業活動的低薪資和單調，以及缺乏全盤的娛樂制度。所有這些因素，進入了道德和經濟兩者交界的情景，而且聯合在貧民窟的住宅、衛生設備及其他生活條件上，產生了衰微，並給予人們一般解組和腐朽的印象。

幫會對這些條件的反映，可從下列兩方面的功能看出：(1)它提供給成員的爲社會不給予者。(2)它使抑制和不愉快的行爲有了出路。它填滿了鴻溝，也給予逃避之路。此處，我們再次看到，它是做爲其成員的填充活動之填充團體的功能。因而幫會本身，可說是一個透過衝突而自然和自生的一類社會

組織，也是大社會架構解組的徵兆。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這些結論似乎已從美國其他地方和其他國家的研究資料中得到了證實。

五、幫會的控制策略

幫會的個別成員，幾乎全部被團體意見 (Group opinions) 的力量所控制。幫會中每一個人都如此做和想的方法，對於幫會孩童有足够的認可和勸阻的力量。在那種情形下，他真正感覺到自己社會世界裏面的公衆意見之壓力。此世界對他而言，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也希望維持其在其中的地位。此種制裁將使團體中的任何種類的行爲，成爲對或錯；也使一個孩童在團體的影響下是一個人，而在離開團體後，又變成爲另一個十分不同的人。

幫會中的意見，從許多不同的策略，如稱讚、優先權、英雄崇拜、嘲笑、輕蔑和遊說等，來展示其壓力；而團體則透過這些不同的策略，來完成其控制。體罰是很常見的，領袖只要不濫用其權力，則他對其從屬者擁有很大的權力。然而決定幫會及其成員的許多影響力，是無計劃和非深思的，因而它被視爲是，來源於集體行動本質的羣衆行爲。

1. 處罰

幫會的一個最主要的控制策略是，懼怕暴力或體罰。在兄弟會中，對於試用人員，所使用的有戲弄的形式，浸入冷水中和體罰等。在幫會中，成員違反了規定，將受到鞭打，極端者更可能被判死刑

。 「在我們的幫會中，有一則禁止咒罵的規定。誰違反了它，將接受成員每一個人的踢打。此原則在進入效果前第四週，由於其執行的嚴格，使得我們每一個人的臀部都酸痛了。

任何人都不密告他人和背叛朋友。誰違反了此規定，將接受成員每一個人十個耳光的懲罰。我們必須錘鍊他，以使他堅強。我的弟弟就受過一次此種懲罰。」

在帶有邪惡和犯罪類型的幫會，不忠常被處以死刑。聖路易大名鼎鼎的 *Races* 幫，即堅持要殺死其成員，因有些成員被懷疑有不忠或將變成有麻煩。在這種情形下，當一個人被判死刑時，執行者是幫會的執行小組 (*firing squad*)。從幫會的忠貞而言，特別是犯罪類型的團體，恐懼對於自己家庭使用暴力，也被認為是一種妨礙。

「*Viana*，這位監獄鳴鳥，它是 *Cardinelli* 幫會的一個十六歲成員，他成為幫會教條的犧牲品。假如他願意承認他洩露了其所屬團體的秘密，則他是可以使他自己從套索中解救其頸子的。這種值得注意的幫會注意力，可在其恐懼威脅其家庭表示出來，然而頑固的幫會，却要求其成員必須做到此事。

2. 嘲笑和稱讚

幫會中另一個重要的控制策略是嘲笑，通常在孩童中稱之為「酷評」(*razzing*)。它包括非從眾者的取笑、非難、戲弄、嘲笑和以無禮的渾號稱呼之

等。而其範圍可從巧妙談話中的暗諷、粗野的啞劇、粗魯的咆哮到刺激的諷刺等。只要一個人被某些親密團體選定為目標後，那麼他就會從此一必須生存的親密團體中的從眾方向，感到持久和殘酷的壓力。在美國兄弟會和每一個國家的幫會手中，此種方式是同化新成員的最主要的武器。

渾號嘲笑的運用，構成了酷評的一個強求要素 (*compelling element*)，而控制的最有效種類，則稱之為屈辱 (*humiliate*)。幫會孩童對於那些沒有達到其標準者，有其自己的一套渾號以稱呼之。膽怯者得到的稱呼為「黃色」或「懦夫」；背叛者的名稱為「叛逆者」或「告密者」；而躊躇不前或不敢應戰者，則被稱為小孩；另外常與女孩玩耍，或穿著太漂亮，或任何女性化行為者，則被稱為女性化男人。一個真正的幫會孩童寧願受任何處罰，而不願接受上述的渾號，因為如果得到上述渾號，則在團體中，等於失去了社會地位象徵，因而必然地對其在團體中的快樂，影響很大。透過這些幫會的集體心像，使得真實生活情境產生了意義；它們就像社會操守一樣，是由互動中界定而得的。

假如小孩還想保持其地位時，則嘲笑界定的孩童不應作什麼的範圍。然而稱讚和英雄崇拜等正面控制的方法，則能滿足其認知慾。想由同伴處獲得如獎品、優先權、榮譽和領袖等的讚美和巴結，使得孩童從眾於，與團體理想和政策相一致的行爲。

「我們幫會有一個義大利孩童 *R*，他經常因被自己最佳以及團體的期待而表現出其能力；然而他

在幫會外的記錄，則不太令人滿意。在幫會中，他常因團體的鑑賞而生龍活虎，反之沒有團體激勵，則變成垂頭喪氣。

在維持幫會讚許時，孩童是透過幫會眼光來看他自己的。他非常注意幫會加於其行為的解釋，同時他在取得幫會角色或某些領袖地位後，他也嚐試着裁判其自己。此種過程可清楚地表現在如下的句子，如領袖將說什麼？同伴們說些什麼？幫會中其他人在作什麼？我不要再如此或那樣的穿著？我將會受到別人的嘲笑？假如幫會去搶劫商店而我不參加，他們將使我痛苦。」

3. 幫會的羣體控制 (Crowd Controls)

幫會視為不朽和耐久的控制形式，則為「羣體作那件行動」(*the crowd that acts*)。其中的一種行為模式，牽涉到特別的「心理統一」(*mental unity*)；而此種現象，黎明則視之為「心理羣衆」的特徵。當幫會變成為激動時，它並不需要理性地深思，它似乎變成為瞬間環境刺激的反應，或幾乎是受其自然領袖所提示的任何暗示所指導而去行爲。

幫會是特別有傾向於強迫性行為的羣衆形式，因為它是一個自然和自生的團體。然而它在保持秩序上，經常缺乏預備程序的保護，甚至在一般的幫會裏，也經常發現維護秩序的困難，如成員間的相互攻擊，他們不乖乖坐在椅子上，他們並不依據規則來仲裁他們的糾紛等。

在羣體控制情況時，幫會控制其成員的另一種

要素，是以人多勢衆來做爲保證。此種勢力能使產生於個人著手爲其自身利益的危險打算之不安得到擔保。因而僅由於人多勢衆所賜予的力的感覺，常常也足夠去扭曲一個人的道德想法，它就是通常所謂的幫會精神（gang spirit）。此種表現暗含着一種強迫和不負責任類的羣體控制行動。

4. 控制的精巧形式

利用幫會成員的解釋，以使其其他成員的行爲，能做更精巧和精緻的變遷，可說是羣體控制最重要的功能。它藉着對於那些不太清晰的符號的閱讀，可使一個人對於別人的情操和態度，有所反應。在面對面的團體中，如臉部的表現，沉靜的姿勢和其他變化，也是大部分屬於非言詞反應的範圍。它們能够使一個人立即地感覺到情境的變化，因而他們界定了情境，也助長了一致性。

做爲親密初級團體的幫會，從一致性中發展出精巧控制的基礎，生活過一段時間後，產生了爲每一個團體成員共享的一般社會遺業。親密的一般經驗和通常深交的本質，提供了形成更相近的同理心（Sympathy）的途徑。即精巧符號的相互解釋，指示了情操和態度的變遷。集體象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用符號、象徵、秘密握手方式、字架和團體暗語等方式具體表現出來；它們使得相互表徵進入更精緻的溝通形式。特別是衣着或體態，也提供了相同的目的，例如特別髮型種類、某些寬鬆上衣或領帶，都可以做某些團體成員的認同標幟。

此種一致性，有時在幫會中（同時在兄弟會中也是如此）是如此的圓滿，因而假如其秘密概念是被允許的，則一個人將會接受其社會地位印象的解釋。結果使得習慣、情操和態度的合意，在某些個案下，變成徹底地單一化，以致於個人的差異似乎被吞沒了。

「一年復一年，由於團體的親密結合，我們學習到較佳於我們父母對我們的瞭解之相互瞭解。我們習慣地從事於某些特徵的嬉戲；但是我們中却沒有一個人敢去做沒有得到羣中精英首肯而會引起個人危險的玩笑。然而吃餅乾者，總會渴望吃火腿等，是一個不爭的傳統，因而他宣稱要吃火腿和蛋，以便去看看他從此新的戲謔中將會聽到什麼？」

當我們沿街而走時，想到我們一向渴望得到的一些東西，將要出現於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時，我們的同理心是那樣地接近。此種親密關係是如此地接近，足夠使我們把我們個別的母親，實際上視爲是每一個人的母親。」

此種親密性領域，已在人格發展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個人定向的範圍，可由地理和感情兩方面來界定。就幫會孩童而言，他的地理領域是包括着家庭到親屬境域的變異，超出此範圍以外者，則爲敵地域和外在世界。

除此之外，孩童尚有另一個親密性領域，在其中他有親密的情緒依賴關係，此領域就是湯瑪斯（Thomas）所謂的「回響」（response）。他依賴於此領域，同時幫會或兄弟會的成員也被此種情感

契約所吞沒，於是基於同理心的一致性建立了；它造成了親密伙伴關係，其中常包括有對於不安定的安全，甚至有悲傷的情感，當然身體的接觸是其中的一部分，這是一個高度親密的領域。

幫會成員常常被這種新親密性所迷住，它變成爲其世界中最重要要素。因而常常或至少暫時地以它取代了家庭或所有其他的關係而進入那種團體，常常也像進入了另一個新世界一樣。在團體中個人某些個性的沈沒，可歸因於某些個人成員的英雄崇拜，而個人同化的延伸，正指示出團體控制成員的程度。」

六、相互激動

幫會中成員的相互激動，使得個人或倆人不敢扮演的行爲，成爲了可能的行爲形式。在團體中最簡單的相互刺激形式，是團隊精神或某些類型的伙伴活動。一般而言，它是與動物團體中的成羣兜圈子（milling）的過程相對應的，同時它經常可做爲其他某些範圍更大的行動的基礎。

犯罪行爲可能產生於聊天會（talkies），或是聊天會中互相激動的結果。聊天會雖然僅僅是一種討論或故事式的試演，然而在其中每一個小孩却可由別人經驗的感染，而完成了其自己的經驗，從而使得激動得以進行。

在某些個案中，雖然在某些方向上沒有以前的經驗、嘗試和希望等，然而相互激動也似乎可能，因爲它可以在那瞬間發展出狂熱，而此狂熱已足以

使追隨於團體的追隨者，完成某一類型的行爲。

七、搶劫郵局

「我們三個大學生——麥克、亞特和湯姆——住在同一屋內，是時我們三人同時在美國南部的一所古老的大學上學。在我們作案的那天，我們三人都在圖書館真正地讀了二小時的書。那天指的是星期日晚上，而我們作案的時間，則爲晚上一點半，或可說是星期一早上。」

在星期日晚上，我們三人是個別行動的。湯姆去看他的女朋友，亞特則單獨去看電影，我則與一個女孩子外出。後來當我出發去安排與同一女孩的另一約會時，我走到了姊妹會房子時，我感到非常興奮，而我離開那裏時，是十點四十五分。

當亞特看完電影後，他到雜貨店買了一包香煙。當他走出雜貨店後，才發覺錢找多了，於是他把多找的錢退回給店員，但店員仍然沒有注意到此一錯誤。這一個小插曲，對我們後來的行動，呈現了重要的意義。

在我進入房間後，我得悉的不幸事件是，我再沒有第二個約會了，此時已是一月廿七日。我的行爲是在投擲一圓幣到櫃檯後才決定的；而以後的討論，並不是任何前導談話的結果，因在我的記憶裏，在此之前，我們並沒有任何關於此事的談論。我們在同住幾年後，我已經從事過許多大學生式不同本質的引人注目的行動和冒險，但却具有一貫的精神。

使得我們談話開始轉到有關銀行腐敗的意見者，可能是由於我們中的一個人注意到州地圖的緣故，然後話題進入了剛好在昨天休息的本地銀行。同時，在郵局特別信件臨時雇員的湯姆，碰巧知道有一些裝有很多錢的袋子，剛好在中午時運抵此處，它們是要交付給銀行的，同時他們很怕被搶了。

我們的談話不經意地轉移到那些以簡單帆布袋放在郵局地上的錢。同時，我們也談到一個小偷將可如何輕易地進入郵局，並偷走它；再者湯姆則順手畫了一幅郵局簡圖，並指出唯一的雇員的工作桌子和槍枝放置的地方。我們最初的談話，完全是侷限於罪犯能如何輕鬆地就偷到那些錢，而後才轉入個人的境地：即我們能如何輕易地偷到那些錢。這種轉變變得自然，以致於直到凌晨，我們仍未能決定何時和由誰來做此事，但最初主要的意見已經完成。

我們談到的可能計劃是，如何才能偷到那些袋子。而此可能計劃則爲，湯姆能藉口看看是否有重要的信件而到郵局，以獲得進門的機會；然後亞特和我則帶着面具和槍衝入，綁起湯姆和雇員，而後帶着袋子逃掉。我們沒有考慮到袋子裏有錢的事實，我們談論的僅僅是扮演此刺激地惡作劇的可能性，而沒有想到實際上如何做此事。在此以前，我們曾經作過很多無害的惡作劇，也是以相同的談話方式開始；但此次因知覺到其危險性，使得此惡作劇躊躇不前。

在經過約一個半小時的談話後，我開始脫去我的鞋子，然而當我脫下後，我突然想到，假如因我的

一個人而抹煞此一有趣的計劃，那將是多麼掃興的事！於是我愚笨地說出，假如湯姆到鬧區，我想我將寫一封早已遲到的信以求配合。那晚，湯姆就急切地等待那一封信，並且他也暗示我也去鬧區，同時說那可能是一個非常有收穫的一晚。我默認後，亞特也決定加入。是故我坐下來並開始寫信，其間我們仍然繼續我們有關錢袋的談話。

在我寫完信後，有些事看起來似乎已有所改變。我們發現想要停止是不可能了：即不是去搶劫郵局，就是上床睡覺。於是湯姆拿出了他的槍，我找出兩條常用的手巾，亞特則把繩子拿出來放在一起。我們每個人都期望他人能對此事發出嘲笑，並建議上床睡覺，也讓那封信睡到明天。那時我們似乎已忘記了每一件事——即我們的學校身分，我們的家庭和朋友，將會降在我們和我們親戚的危險，我們唯一的想法是，如何完成此惡作劇。我們完成了我們的準備，多多少少是機械式的，我們的心理已處於眩惑的狀態。

穿上平常的外衣和帶上帽子後，我們靜靜地離開了房間。在到鬧區的途中，我們通過了夜間巡邏哨，其中並沒有任何的爭論。然後，湯姆則像以前做爲次雇員式老顧客的樣子一樣，順利地進入郵局，我和亞特則蹣手蹣腳地走到後門，而後湯姆則出現於窗口，這是表示我們的計劃已成功的記號。由於門內燈光很亮，因此我們蒙上手巾，掏出手鎗，一切已準備就緒。我轉身問在我後面的亞特說：「你是否有完成此搶劫的勇氣。」他說：「假如你有，我也有。」

坦白地說，我感到我必須走這些，但是因為一些未知的因素，在那裏我竟不能表達出某些我們是否完成它的意見，同時亞特也不能。事後他說他已嚇呆了，因而無法有所建議。那時我們倆人似乎都已陷入眩惑的境界。

湯姆打開門，然後我們依照原先的計劃完成了工作。事件進行中，守夜人並沒有作激烈的反抗。

甚至等到我們拿了幾千元在手中，而離開郵局後，我們還不曾確知我們所做的事的意義。我們的第一句話，並不是已獲得錢，我們只知道，我們已全部成功地完成我們的惡作劇，它對於我們而言，直到現在仍然是如此。當回到房間後，我們把錢藏在一個廢棄的容器裏，此時此事的嚴重性，才在我們的心裏出現。而後有一小時之久，我們靜靜地躺着，然後決定了一個計劃，即把錢偷偷地送回，而不使人們知道是誰幹的。然後我們就上床睡覺。

在此個案中，我們逐漸地激動，並透過談論以做好行動的準備，但在行動可能前，我們則繼續保持着一段很長的活動狀態；可是一當團體行動開始後，我們每一個人也就不再有其個人的個性。」

八、社會角色與幫會的行動模式

幫會中的每一個成員，因為一般事業是需要分工的，因而在團體中都有其明確的地位。同時不斷的衝突，可能不經深思地就需要有一些領袖、部屬和成員的訓練。一當幫會開發出更複雜的活動後，

團體成員的地位，便更為確定，同時社會角色也就變成更為精確地分化。此過程的結果，能使得團體產生多少較有效和和諧的社人組織，也使得集體事業能有滿意執行的可能，同時進一步地形成了以團體為主的興趣。這就是所謂的幫會的行動模式。

1. 幫會中的社會角色和地位

社會角色的社會學概念之意義——即個人在團體中的角色——可以在幫會的研究中，很清楚地顯示出來。

在幫會中的每個成員，都可得到一個角色和名字，它仍是一個人，在與幫會中其他人相較後，在幫會中所獲得的地位和應扮演的部分。一個人在已成型的幫會裏，就像被塞入謎箱中的某一梭子一樣地被塞入適合於它的地方，他是被幫會加於其上的規範所塑模而成的，他不能脫離其角色而精明地或瞭然地去學習一些事物。

2. 此機體是一個整體 (The "organism" as a whole)

每一個幫會都是一個整體，其他類型的社會團體也是一樣，都須以一個具有行動模式的整體來視之。在幫會中的每個人，與別人比較而言，都扮演著特別的功能，或換一個方法而言，即每個人都任職於其適於任職的地方，而此地方的選擇，是幫會依個人早先經驗表現而決定的，如果沒有團體，則此處使用的社會地位意義，也就不存在。

然而，每一團體的行動模式特色，很難被想為

是僵硬或靜止的，因為它必須不斷地改變，以容納損失和新添補的成員；而成員的改變，乃由於幫會成長或經驗的增加，以及其內部或外部的改變。

幫會與外在者的衝突，或其他事業和活動的執行，造成在成員間有某種社會階層化的現象出現。它們通常都有三個分類（多少是確定的階層）：(1) 內圍 (inner circle)，即包括領袖及其助手。(2) 幹部和成員 (the rank and file)，他們是有良好記錄的幫會構成成員。(3) 外線 (the fringers)，他們多少是屬於追隨者或不曾被視為是正規的成員。

內圍通常像星座一樣，是由與領袖有特別親密關係的夥伴所組成。幹部和成員，則是一些較少進取心和能力者，他們是隸屬於內圍，當然也是隸屬於領袖。然而大多數的幫會，並不是一種很緊密的結合，而是具有某些追隨的團體或結合——那就是外線——他們是年幼的追隨者或傾慕者。他們構成了外圍，他們的計算，並不包括所有可資利用者；也避免計算在遭到困難時，可能完全被根除的範圍。因而幫會常默認他們的喝采和臨時的有用性。有些新幫會的胚芽，即由外線所形成。

3. 地位的奮鬥

幫會的內部運作，吾人可視為是，為承認的奮鬥。它使沒有權力的孩童，在獲得地位上，有較佳的機會，從而使他在社會角色的發展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部分。

幫會內的奮鬥，有衝突和合作兩種方式；它使

得孩童能在相互比較中定位出其位置，結果造成了以領袖為中心和指導者而成的個人相互關係的星座。它可以「互動的社會角色之統一體」，同時它也可以被視為是，個人相互間及其領袖間，多少有下屬和上級關係的衝突個體之適應體。

它的每一個角色，都是透過其可能的隸屬關係的界定而發展出來的。在幫會中的任何標準，是勝過其他一切的標準，同時它也使個人常有攻擊其地位的機會。幫會活動的參與，就孩童而言，其意義就是一切。它不僅決定了他甚為在意的唯一社會的地位之界定，而且也變為其自我概念的基礎。幫會成員可能說：「我寧願做住於巢窠的外線，而不願永遠是一流賭窟的最佳打手。」

基於此理由，幫會孩童對其在幫會中的地位概念，比較其他社團成員，是來得鮮明。因為他是生活於現在之中，他瞭解到他在生活中所扮演的部分，就如同在幫會中所扮演的一樣。從而在其他團體的地位，是不重要的，因為幫會才是他的社會世界。在他希望取得的認知地位下的奮鬥中，他可能使出高超的姿勢，如勇敢、野蠻或變成罪犯來完成其功績。因而從個人在幫會中的主要角色的概念的瞭解，將可幫助我們去解釋，為什麼大社會難以控制他。其理由是，一旦一個人有法庭記錄，或被關入獄，則帶給他的只有聲望，社會的反應，僅僅在幫助他提高權力，而不是懲罰或改造他。是故，代理者如想嘗試再指導此犯罪孩童，則必須經由他的重要社會團體才能完成；因為在那裏，他才能對其實質的自我概念產生興趣。

4. 選擇的過程

在幫會中存在著一種選擇過程，以做為地位奮鬥的結果，從而個人的最後地位才得以決定。此過程的結果，大部分是決定於個人本有或獲得的差異，它使得此團體成員具有某種特色。假如其他條件不變，則高大強壯者較短小者有較佳的機會；體型上的自然不同是很重要的，生理的殘障也扮演了一部分影響。自然和成就的性向，和體質差異一樣，也能給個人某些利益，此種有意義特性包括的為信仰、情操、辭性、特殊技巧等。假如幫會的所有成員，都是真實的相似，則地位和社會角色，僅能由幫會活動過程中產生的機會之機運的不同來決定。在實體上而言，兩者都發生了影響。

所謂體質不同，在決定地位上是很重要的，它指的是大個或強壯者的事實，常能憑此做為領袖的本錢；而巨軀 (bulk) 通常指的只有打架的優勢。僅是體積，雖可能使土獺獲得幫會控制權，然而其領袖地位的保有期間，則常常是不穩定的。

透過補償機轉，體質無論在任何場合常常會幫助他決定其在幫會中的地位。在這種情形下，缺陷對於某類行為的扮演，提供了推進的服務；同時由於他在某方面的特長，將使其較低的地位得到補償，因為此種較低地位的獲得，乃是孩童感到其缺陷而自願擁有者。因為此補償，乃是他的可能角色，與他感到該扮演的角色概念之間的差距而產生的。

「AI」的例子是幫會中的地位，如何藉著體質

缺陷而決定的一個有趣的例子。由於他常為諺語口吃所困擾，自然而然地被大多數成員視為是下等者。然而在每一個任何需要膽力的事件，或任何有表現其很正常的機會之處，「AI」都在那裏，以求能有機會證明他的價值。有一次當有二或三個傢伙，準備搶劫高爾夫商店時，沒有任何人願意打破玻璃及爬入店內。「AI」志願地脫去其草帽，把它蓋在玻璃上，並以其拳頭使勁地打破玻璃。其所以做此行為的理由，乃因他常常受到輕視，因而他很嚴肅地接受了此賭局。由於他的成功，使得他例外地成為一個好的玩家，此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裏，他就以此方式賺錢為生了。」

假如小孩能够以某些有效的方法，以補償其缺陷，則缺陷將不會成為其避向領袖地位的不可克服的障礙。

在幫會內，打架是決定一個人地位的主要方式，每個成員經常都在比較其拳擊能力，幫會也經常保證公平的戰鬥，並盡可能地提供了相同的條件。在某些幫會中，最佳打手常被視為領袖，他能夠對付挑戰者全體而保住其頭銜。

除了打架外，在幫會參與的其他活動中的優越，也是獲得承認的一種方式。就大部分的幫會而言，這種情形特別適用於比賽英勇的園地，但它也可同樣地適用於勇敢或掠奪的園地上。硬漢經常是獲得聲望的一個手段，通常當一個小孩遭到逮捕，並有犯罪記錄，或曾被收過監後，他受到的是稱讚的尊重。

5. 幫會中的特殊角色

在幫會中，除了領袖外，尚其他的社會職權者。他們像領袖一樣，是由個人品質，在奮鬥和活動過程中而決定的。他們是團體經驗的結果，是由所有複雜的互動來決定的。在幫會中此主要角色，由於他是不同類型的領袖，因而有時他是與其他成員，有著顯著的區別。

假如一個富想像力的小孩，並不具備親切和體力品質的傑出特色時，他可能變成幫會的軍師（the brain of the gang）。

「貝利是我們幫會的軍師，他是受過高級中學的有教養者。他雖然不是經常來，但成員都願意奉獻贖物給予他。有一天當我們搶劫了一輛貨車後，我們打了一個大勝戰，得到了香煙、汽車和很多其他的贖物。貝利把他的一份放在箱子裏，上面覆上稻草。在碰到了夜間守夜人時，他看了看稻草，貝利則說此稻草是為兒子所準備。後來貝利願意以每條一元五角的價格出售其香煙。」

貝利願意為我們的幫會計劃事情。當我們離家遊蕩時，貝利為我們準備住處。他給予我們麵包店的鑰匙，以便我們在餓時，能得到食物充饑。通常在麵包師離開，而店面尚未開啓之前的清晨，我們可得到食物，到現在我仍然保有利溫斯頓麵包店的複製鑰匙。假如我們因餓偷麵包而被捕時，他們也會放走我們。有時成員並不給我東西吃，故一旦我有錢時，我也會叫他們滾蛋。貝利曾在某些屋子或地下室中，為我們準備好睡的地方，同時他到

處去尋找可以住宿和搶劫的地方，他是一個正式的調查員。」

像古代的弄臣（Jester）一樣，滑稽小孩儘管經常仍受到別人的侮辱，但他還是受到容忍。他的無責任，乃因為他的滑稽可能性而得以免除。此類行為有時是企圖去補償某些特質的結果，如高住階聲音。然而他在幫會中的地位，終究是不高的。

在幫會中具低劣地位者，是娘娘腔的男人。他所以受到如此的評價，可能是由於具有女人似的特質，不喜打架與沉醉於太多書籍或其他有教養追求的興趣之緣故。因此他得到的常是女孩子的綽號，而通常孩童都徹底地避免贏得此種角色。

另一個在幫會中常出現的人物角色是吹牛者。他是自我主義者、吹牛者、自誇者、愛賣弄的人和團體中的大嘴者；而團體中的其他人，對他的言行，則常打折扣。他依靠的是大聲來引起別人注意，不然很少人會注意他，或者是利用其在幫會中的本有角色概念，才能吸引人。他可能太過分重視自己，他的最後地位是很難料想得到的，甚至在某些個案中，是不被期望者。

每一個幫會常有其代罪羔羊。他是那些被視為是愚笨的孩童。他在心理測驗上，可能是不正常的，不論做任何案子，他常常可能是被捕者。假如他再兼有某些特別的愚笨特質時，有時則被稱為愚笨的傢伙。同時在多數的幫會中，也常常利用沒有經驗的孩童，來做為其傀儡。

特殊角色的本質、數目和變異，大部分是決定於幫會活動和從事的事業之本質和複雜性，而它們

之間的相互關係，便構成了幫會的行動模式。假如幫會維持為一個團隊的形式，則個人性向在分派地區中，扮演了重要的部分，而特別的能力也常常帶來了某些類型的活動。幫會在沿着運動競技和犯罪追求線上的發展中，其本身可能變為高度的特別化（功能類型）。幫會愈特別化，通常其成員的分工，則愈分化。

狂歡團體中的社會角色和地位的決定，除了在組織中那些人物的個人特質的計算，雖是與他人相互比較而得外，但其標準則不同於幫會，或者至少有不同的尊重，其他則是相似的。

才能多樣性特質——如歌者、舞者和戲弄者等——在波士頓幫會身上，表現了出來，同時也是芝加哥幫會的特色。這些遊戲常能發展孩童的才能，而這些才能也可在後來的難要階段發現其地位。它可以年輕紐約幫會的添補人員，以及靠近十四街和百老匯附近，歡娛電影街羣衆的 Hell's Kitchen 來做為例證。

6. 社會角色和綽號

成員的社會角色是藉着名字而在幫會中被認知。個人特性在決定地位上有很大的影響，它幾乎把孩童整個地位都染上了顏色，於是他有一個名字，他的名字常常指示出，他在團體中被他人尊重的程度。從很清楚的原因來看，大個而強壯者，通常是不會得到屈辱式的名字。在有一個例子中，幫會的真實領袖（不是名義領袖），是不允許他自己有那樣的綽號。

7. 正式認知和控制的影響

在幫會中為認知而生的自然奮鬥，大部分是伴隨於社會選擇的自生過程。其一般模式大部分是應由攻擊、防禦、襲擊和其他集體事業的強制協同行動之必須而產生的；而成員在這些幫會行動中所創造出的多種社會角色中，透過奮鬥和選擇的內部過程，盡其才而任其職。在這種方式中，一個孩童在幫會中所獲得的地位，乃決定於幫會的自然組織。

當幫會愈成為正式組織，它常常給予蓬勃的名譽和角色的認知；雖然這些名譽和角色是自然而生的，但幫會並不能隨意地把它們分派給成員，因為它們是集體經驗的結果。當很重要的正式人員恰巧不能成為自然領袖時，他們也能保有其在團體中的指揮者的權力，然而此人員多少已變成傳統式的名義領袖。有時強加正式組織於幫會自然結構的結果，會使團體產生傾軋，從而形成趨向於解體的第一個步驟。

某些定量的幫會外部控制，可能以透過贈予成員或團體為一體（一家人）的名譽而達成。由不同或包含更廣的團體之高貴人士所贈予的榮譽和獎品，是帶有人類本質的魅力。美國大學頒給為其學校球隊服務的運動家以大學代表隊的證書，此證書通常是比大學文憑更有價值。相同態度，社會福利事業機構、遊樂場、商業組織、政治家和其他代理機構，在處置幫會時，也可以使用贈予綬帶、獎章和獎杯的方式。

但是此類控制的限制是很明顯的。在許多例子

中，表現出榮譽的授予是趨向於結果，而不是服務扮演的本質。然而正確謹慎的榮譽贈予，也可滿足基本的人類慾望，故可以成功地做為控制的方法。

想要合併或使用幫會的社會代理機構，必須小心地把正式組織滲入團體的自然行動模式中；否則許多的努力，將會失去指導性和浪費精力，並產生異議和紛爭，甚至解體可能會隨之而來。孩童工作者，必須順着幫會的自然力和機械去工作，而不是反對他們；它們的功能必須被引導和指導，而不是把本來沒有的外部東西，硬塞入其脈絡內。任何正式的組織架構、獎品或榮譽的給予，必須斟酌與孩童們自己自我概念的相對稱，因它是孩童做為自己對幫會忠貞和未來幫會領袖的取得之基本條件，而不是做為正式團體或大社會公民的參與者。

九、犯罪技巧的學習

孩童在幫會裏，是從觀察中學習到犯罪技巧。年長幫會的作為，是年輕幫會最有興趣討論者，很少年長幫會是不利用年輕的孩童。芝加哥 *Beer-running* 幫會曾經雇用孩童為其駕駛贗車，那些孩童看起來是那麼純潔，且駕駛技術又顯得那麼拙劣。

然而幫會孩童的獲得更有效的犯罪技巧知識，是從本身幫會的參與和技巧使用的觀察而取得。幫會所進行的活動，則有變行和所有種類的偷竊；搶案意謂着小的偷竊，而搶劫在幫會中是很平常的遊戲，且從此可發展為用槍做夜盜或搶劫的嚴重類型。

有些幫會常特殊化於某一特別類型的犯罪，但大部分幫會的活動，則包括整個犯罪的範圍。亦即包括實際犯罪目錄中每一項的犯罪。

有關犯罪技巧的正確資料，是由幫會來傳授的。

「在幫會中學習到的一些有問題的活動之一是不使用鑰匙而能以不同的方法打開門鎖。其中有一種方法，僅需要一段細繩和一節雨傘骨，就能達到目的。假如我想進入我的房間，或進入社會福利機構的小櫥，但我沒有鑰匙，幫會中的任何一員，都能在數分鐘內，為我打開它。假如你不想被打開，你最好是不要把門上鎖。因為你上了鎖，正好助長他們打開它的好奇心，然後下一步驟，則是非法取得的誘惑，因為規則則是事後必須下鎖。」

如何去搶劫、撬開貨車、搶奪麵包店、搶奪手提包、勒索店東、掏空自動販賣機、扒竊口袋、順手牽羊、進行攔路行劫、洗劫醉鬼、取得萬能鑰、偷竊汽車、出賣贗物、購買手鎗、無聲的行動、偷竊商店、戲弄警察等等行為，就是以幫會為交換所，而取得的技術知識類型。

大多數的幫會成員，並不像有些幫會的成員一樣，是全天候從事犯罪行為，他們可稱為準流氓或間斷性流氓。然而就長程而言，兩者的教育結果是相同的。

十、幫會成員的態度發展

在都市環境裏的幫會孩童社會世界，能從事的

全部掠奪活動，有着豐富的模式之證據是很多的。幫會對這些活動雖沒有任何顯著的非難，也並不加以支持，但它却有成員必須遵守的一套自己的規則。我想到有一個叫做印度犯罪部落的幫會，他們承接的活動變異範圍很大，而這些活動則被大部分的社會組織認為是掠奪式的，因而才由他們取得合同。但是就其自身而言，這些活動，則被他們的神認為是要受到制裁的。然而此幫會因不具備他們文化歧異 (deviance) 的想法，通常也接受大社會的規範，但這是對其文化的一種反叛。實際上他們反抗社會規範的殘忍性，正表現出此幫會孩童的特色；而他們的接受社會道德規範，始終是表面的，因為他們對於既有規範的不尊重態度感到有味。

在幫會掠奪類型的經驗，使得孩童發展出漠視法律和秩序的態度，此種態度正是成就為歹徒的最基本特徵。外人的個人或財產權利，在他看來是一種好的餌食，始終是不受其尊重的。對其他世界的優越性的成長，是因團體權力和安全的增加而得的結果；於毫不介意的態度，有些個案中甚至不可相信的勇氣和沒有規矩也就滋生了。再者，由於警察的視而不見和政客的加以保護，上述態度頻頻出現，以致於恐怖社區產生了，但沒有人敢向它挑戰。既不是公眾的共謀，才形成其維持不墜的必需條件；而就幫會成員本身而言，他們是有某些憎恨的理由，才使他們針對執法官員，而施出暴亂、打鬧或下賭注的方式。

幫會孩童很早就學會獨立自主，它是成為歹徒

的一個特色，即學習如何離家出走，並在自我資源內渡過一段時期。他常駐足於公園、溝渠、河道邊和森林保留區，他幫助鄰近農忙的農人，並居住於報紙紙筒中。即使他與原來幫會失去連絡時，他很快地學習到不依賴別人，但他也能很快地與別人相處，在有必要時，他隨時可以截斷其停泊處。

「有一個十五歲的小孩與三個同一幫會的小孩，一起離家出走。他曾經是一個孩童俱樂部成員，他父親的老板曾經為其當地成員資格而付錢。他離家出走三個月後，直到他的幫會搶劫了一家位於哈里遜街的廉價旅館被捕時，才有了消息。在那裏警察發現了價值一萬元的貨品，而有四十到五十個夜盜被提出控告。此案件開始於打電話到被竊的家裏，當確定無人在家時，再把一個小孩從窗戶進屋內，以便打開大門。」

最後孩童通常在幫會中學到的是宿命論和願意一賭的態度，而這些態度，正是促使他願意從事犯罪生涯的生活哲學。怎樣才是勝算？賭他一次！他學習必須能忍受被捕。無論如何你遲早將被捕，那麼為什麼不賭他一次呢？每個小孩對於社會懲罰機構都很熟悉。小孩站在芝加哥某郡學校的窗子上，看着中央伊利諾伊向西行的郊區火車說道：「我們到聖查理斯斯的咖啡磨房去或我們到下一站去。」小孩很快地變成有注目而過的觀念，但他們期望的是下一站。有一個小孩則熱心地期待此旅程的後半階段，他說：「在我進行之前，我很想看看 Pontiac 和 Zoltar 的內部有什麼。」此情操的邏輯發展極端，則表示出亡命之徒的態度。有一個十六歲的小

孩，他的哥哥被吊死了，而其本身則為某一特殊犯罪幫會的領袖，他對於所有誠實的電影都有所批評。他說他所以如此乃是：「在我被吊死之前，我想殺死警察。」

「有一個歹徒在攔路行劫中，牽涉到謀殺行為。他說：『我願意被吊死，而不願意回監獄，我討厭監獄。』他們可能為此事給我一條繩子而結束了一切。哈里遜街是為其職業而被吊死的，在被吊死前，他在鄉村監獄曾對我說，我並不在乎被吊死，不論如何我有三比一的勝算，他願意賭這一局。他的意思是他可以生存三次，而州政府只能撈回一次本錢。我也已準備好被吊死。」

在無秩序的生活中，有什麼最好的教育，是比幫會所提供的教育，即類廢個人的教授，犯罪技巧的教導，對於法律的冷漠，不信任和不負責的態度之傳授和養成賭一下及宿命論等更好呢？

十一、太保的社會模式

假如少年不受幫會或幫會形式俱樂部等犯罪學校的命令，而不能成功地成為精練的罪犯時，他們經常發展另一種社會角色類型，這種類型可說是歹徒和槍手的前兆。這類型的孩童，可以用太保來稱呼之，他是最不受幫會監督的一類青少年英雄。太保是一個清楚的社會類型，他對於正常商業和愉快的追求之干擾感到興趣；他認為它真的或通常足夠地是為其自己的享受計劃的興趣。他破壞了舞會，蛋打演講者，侵犯學童，當街調戲婦女和女

孩或參加搶劫個人財物。他是野蠻的人，只要有機會他就喜歡去掠奪或破壞財物。他不曾擁有一個職業，而是常在街上和賭場遊蕩。他是一個閒混的人，一個懶鬼；他在抽煙、賭博和粗魯玩鬧中過日子。他的虛張的勇氣，常常會助長打架；但是除非有夥伴可依靠，他是很少參與公平的打架；他的言談是粗鄙和無教養的。簡言之，他是一個徹頭徹尾地無組織者，假如他目前的進展趨向是走得够遠，他有相當大的可能會成為罪犯。

十二、犯罪的後階段訓練

未受幫會監督的大孩子和年輕人，沿着更嚴重的犯罪性方向繼續此類廢的過程；而此過程的最後產品，就是打手、鎗手和全能的歹徒。

一當幫會老化，他們便嘗試要被社會所容納，然而他們一般地都變成爲強有力的會社 (athletic clubs)。它雖然已披上「可尊重的外表，但並不能保證其實體也是一致的。因而類廢的習性，無組織的態度和有問題的活動，常常在合法功能的掩護下，以會社組織形式不斷地繼續和增大。

十三、犯罪幫會的訓練

老幫會可能並不必呈現出任何正式組織的形態，但確已不知不覺地陷入嚴重的犯罪。到 pontiac 感化院、郡監獄或 Bridewell 的短期遊戲，是此階段單調的幫會活動，然後假如犯罪一直重複或更加自暴自棄；他們就走向了幫會孩童的最後階段，即

進入 Zoliet 州感化院，聯邦監獄或上絞刑台。

尼古拉維亞納是一個十九歲 Sam Cardinelli 幫會成員，在其受絞刑前曾經就犯罪幫會及其賭場集竄對於孩童的影響，作了有意義的註釋。

他說：「我穿着短褲進入 Cardinelli 賭場，一星期後我就犯罪了。」

維亞納和三個同幫會的成員，是因攔劫行動中謀殺了酒吧管理人而被判絞刑。但幫會領袖 Cardinelli，雖在案件發生時沒有在場，但他却供給四個孩童連發手鎗，並送他們去搶劫酒記。

在芝加哥牲畜圍欄 (stock yards) 不遠處的一個叫做 Canaryville 的地區 (district)，曾經有一個時期是有名的邪惡幫會滋生地——都市生活中道德機能喪失的地區。有些芝加哥最令人絕望的罪犯，通常都被認爲是 Canaryville 鎗手學校的產物。

Look 郡州檢查官在其任職了七年主要控訴官後，因此地有比其他地方產生更多下列的各種犯罪行爲——即銀行搶劫者、薪資搶劫者、汽車搶劫者、攔路搶劫者和暴力惡棍等犯罪行爲，遂以此認爲此區域的白人太保是具有特色的。

有一段時期，Eugene Geary——後來 Moss Enright 的被保護者，是發展於 Canaryville 地段的鎗手學校的一個領袖。他早已被警察視爲是，芝加哥地區最危險的一個人，一個常帶槍且射擊快速的殺人兇手。他自傲於因強勁打手、歹徒和全能壞人等成績，而贏得的不佳聲望。

生產 Moss Enright, Sonney Dunn, Eugene

Geary, Gentleman Brothers 和許多芝加哥最壞類型罪犯的地方，就是 Canaryville 地區。此地區也是強有力的會社，其他類型的年輕惡棍和歹徒組織的活躍地區。再者，在那裏到處存在着不名譽的賭場、歹徒橫行的酒吧和其他犯罪集竄。」

Gerald Chapman，一個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六日被吊死的全國有名的罪犯，可說是由幫會啓蒙，進而形成的類廢類型之最後產品。他在十五到十六歲時，從街角流浪漢階段畢業後，便成爲 Park Avenue 幫會的一份子，此幫會成員的自暴自棄品質之等級，是介於 Gopher 和古代 Car barn 幫會之間。

假如幫會能視爲是城市中經濟、文化和道德交界的一種產物；則幫會成員亦可如是視之。他經常是一個犯罪者，但他在大多數個案中，不能被視爲罪犯；而是一種他發現他不能脫離的情境結叢之產品。並沒有真正壞孩子的標準，是被兒童兄弟界所採用；隱藏於此觀念之後者，即由社會所界定的壞孩子的概念，大部分是因美國生活處於激動和再調適過程的混亂情境，而產生的解組力量所創造出來的想法，毫無疑問地似乎是健全的。

十四、幫會與有組織的犯罪

把大部分芝加哥的犯罪，想成爲是頑固的罪犯或成人幫會活動的結果，將是錯誤的，因爲在掠奪式孩童幫會和犯罪青年或成人之間，是沒有清楚和迅速區分的標準。再者他們因不知不覺地漸次沈溺

而出現在相互之間，是故後者的大部分可以從前者中得到他們的真正解釋。許多犯罪幫會同時包括着青年和成人。成人幫會的形成規則，大部分是在廿歲以前組成，它徹底地具有青年團體時所確立的傳統。它代表的是，年輕幫會的成長和永存，或至少在年輕團體中訓練出來的習性和態度的成長和永存。因而由幫會所促成的犯罪，只能追溯其孩童幫會的根源，才能加以瞭解。

然而十六歲以下孩童的犯罪，並沒有大的增加；同時此年齡的罪犯人數，與整體孩童數的比較而言，也是很小的；是否它在平均十六歲以上的罪犯也可能已減少。

今日犯罪的一個驚人的事實是青少年犯罪。有關青少年年齡的犯罪統計，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因為它們常不能代表最初犯罪，或甚至孩童的第一次定罪。然而有關逮捕、定罪和罪行的統計，則表現出大多數的犯罪行為，是發生於廿一至廿四歲之間，而大多數犯罪竊盜、夜盜、詐欺、偽造罪、強姦罪和侵犯私權等罪行，則是屬於十九歲的年齡。再者，犯搶劫殺人、敗壞風俗、暴力、暗藏兇器、詐欺、通姦、妓女、賭博和違反都市條例等罪行，則大多數是屬於二十一到二十四歲的人。它證明了犯罪生涯的大多數個案，是開始於被司法制度判刑以前很久的日子裏。

1. 犯罪生涯開始於青年期

把犯罪生涯擴展到青年期的想法，部分地是想

指出今日青年罪犯和有些青年參與了掠奪活動。威廉希雷 (William Healey)，一個謹慎的個別罪犯研究學生，他說：「所有犯罪學生的最大興趣，乃集中在確定一般犯罪生涯，開始於青年期的事實。」他認為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此時期的成形條件 (formative conditions of this epoch)，因這個時期的最重要的需要是適應。

在芝加哥，幫會可能是最重要的唯一因素——在孩童人口部門中，製造了大多數的罪犯，因它決定了青少年社會適應慾望，如何得以滿足的活動。芝加哥一〇到二〇歲的叁拾伍萬人中的大約十分之一的人，是受到幫會頹廢態度的影響。它暗示出，再引導他們的精力於更健全管理的設計性實用計劃的重要性。然而目前的減輕犯罪提案，包括高保證金制度到禁令的廢除，它們中却很少認知從源頭來討論此問題的必需。

芝加哥青少年犯罪統計指出，頹廢情形的發生是多麼早：非行模式在十六歲以下的孩童中是多麼地普遍。

然而年幼幫會兒童，較喜歡危險性少的犯罪，而年長青年則喜歡從事於較嚴重的犯罪。而那些孩童所犯最重要的重罪，則是與財產有關者，即搶劫、夜盜、竊盜和收受贓物，次要者為搶奪和開設厚臉皮的賭局。在那些非行中，偷竊則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罪行則有用汽車犯罪、暴行、用致命武器攻擊、攜帶黑牌武器、賭博、收受贓物和違反禁令。

大多數準犯罪案件，則為妨害治安行為，其他的包括經營妓院、賭博、違反都市和公園條例。

前文曾指出，大多數經歷少年和孩童法庭的小孩，可能是幫會成員，而幫會則影響他們走向犯罪。但上文所引用的統計中，只有有關青少年的犯罪類型，而可能受到青少年幫會影響但尚未被捕的犯罪人數，則僅有在具體個案的研究中，才能找到。舉例而言，有一個幫會的四個十九到二〇歲小孩，曾經在一夜之中，從事了二十四種不同的搶劫，而為達此目的，他們使用了汽車以搶奪他們的第一次犧牲者。有五個十四到十六歲的小孩，在警局中承認他們在兩個月中，曾進行了二十五個夜盜案子。另一個幫會的六個十七到二十歲的孩子，居住在公寓中，以夜盜為生，當他們被捕時，已在六天作過六次夜盜。

在進入年長幫會犯罪活動之討論前，我們有必要簡要地瞭解芝加哥地區，幫會在一般犯罪組織裏，所扮演的功能的概覽。

2. 犯罪的組織

現代犯罪的嚴重性，大部分成長於下列的事實：即零散發生和偶然發生的犯罪，業已停止，而進入有組織和持續不斷的犯罪。

對於非法活動感興趣的無數個人和團體，已變成有相互間的關連，以致於保證犯罪已較安全、有效和有利。同時，在芝加哥大部分嚴重犯罪的發生

，是植基於商業效率。

芝加哥和其他大城一樣，有所謂黑社會地區，此地區的生活和活動，是以缺乏通常習俗，並以大部份從事於掠奪活動和利用基本人類慾望和熱情為其特色。除開人間廢物、寄食者、有問題人物和準犯罪階級外，大約尚有一萬名職業罪犯，習慣性地從事於主要的犯罪。

犯罪社區的某些方面，假定出其所被描述為道德區域的特色。

「在都市人口趨向於區別和分割的影響下，每一個鄰里，都可能被假定為是一個具有道德區域的特色。例如罪惡地區，在大多數都市中都可找到。一個道德區域並不需是一個住宅地區，它可能僅是一個約會場所，一個常去的地方。」

此種地區，是由幫會地域和其觸鬚以及衛星地區所構成。幫會在那些地區的巢窟是街坊、酒吧、賭場、遊樂場、路邊屋、俱樂部房間等等。而每一個成員常去的地方，常常受到其他相似地方的影響。它們之間的相互連鎖影響乃是由秘密情報系統所供給的，由於資訊能很快地旅行於黑社會的各個角落。

犯罪社區的一個顯著的特色，是它的易變性（fluidity）。然而大多數巨大明確的組織，則大部份仍是封建的形式，它們並不具備不變和堅固的永久特色。新聯盟和合作的成立之容易，是令人吃驚的。某些團體的一些人，可能為了一些犯罪事件而

聯合在一起；但不久後，他們可能成為死對頭並且相互殺戮。一個幫會可能在某些有利條件下，長久堅強地結合在一起，然而假如有真正意見不合出現時，它可能已準備好分裂為兩個或更多的派別；每一個派別最終將為一個分離的幫會，而成員可能有時會潛逃到敵方陣營。其時，領袖易位容易，有時多少是暴亂的，但對於幫會的經常活動，則沒有多大妨礙；而當成員被暗殺後，幫會也經常能找到年輕人來遞補此老人的位置。

雖然有組織的犯罪，不能以具有巨大嚴格和堅固的結構視之，但在犯罪社區，它却有一些驚人的組織性質。即在此社區中，有某些個人和團體擔負着某些特別工作，並呈現出分工合作的相關狀況。更有進者，雖有個人和團體的聯盟和同盟，但是他們在合法事業上的關係，却是不固定和不持久的。

在犯罪社區中的特殊個人，有時是自由騎兵，有時也與確定的團體混成一體，其中上層者則為專業罪犯，如以商業名詞稱之，則可稱之為犯罪事業家（criminal entrepreneurs）。他們提供了組織的精力和犯罪的商業頭腦，他們就是經營大部分非法事業的戴大禮帽（silk-hat）的歹徒。他們必須與為他們扮演某些不可或缺的功能之某些個人或團體有密切的連繫。收藏者或收藏者聯盟，必須雇用之，以處理贖物或抵押品；醫生或有時甚至醫院是罪犯醫藥援助的依賴者，但不可以給警方知道；行

賄完畢者和政客則必須依他們以影響法律；職業或有束縛的保證人，依賴他們以供給保證金。而刻薄的刑事律師，則必須與他們在法庭中參與操縱犯罪利益；貪婪的官吏及其他內線，必須想辦法幫助非法剝削。上述人員的全部結合，套一句商業用語，即構成了黑社會的「功能中介人」（functional middlemen）。

除開一些很特別的因素外，犯罪事業在犯罪社區中，也使用了很多其他的分子。他們是一些能被信賴的具有某些可確定的支援或一技之長的慣竊。因而經常出現於此地區的很多遊民、惡棍和流浪者，都願意為犯罪委託契約，而結合成不明確的聯盟。此外，尚有一些奉迎者和幫忙者等準犯罪階級，他們是經常受雇於合法的工作，但他們也會為犯罪一邊的金錢，而從事一些有問題的策略。

3. 犯罪幫會的形成

有些犯罪幫會，是由已陷入犯罪的青年幫會所形成。然而有很多的個案，如季節犯罪團體，其所代表的則為犯罪社區中許多不同分子的聯合。一當幫會孩童長大後，選擇的過程產生了，以致於有許多人重新被納入家庭，而重過社區生活，但仍然有一些接受幫會訓練較好的罪犯，由於一些或其他理由，不會離去。

這些孩童中，有些可能有精神或氣質上的特異，但大部分則是因特別環境組合而造成社會適應困難的犧牲品；其中使他們沉溺於犯罪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庭登記有案者，以及曾經與矯正或司法機構有關係或有經驗者。因在我們幫會中的許多成員，擁有感化記錄和犯罪記錄是不值得驚奇的。只要有犯罪生活的習性，便使得他們不斷地要依附於犯罪幫會，以求有表現的機會。因而從某一觀點而言，就幫會表現的本身，以及其在大結構中所扮演的功能來看，有組織的罪犯，可能是濾過和選擇過程中最後產品的犯罪殘渣 (Criminal residue) 之結果。

這些殘渣可被想為是構成犯罪社區的主力。幫會形成於此種社會階層上，是有與由芝加哥初級幫會地區中自由流浪的孩童人口所形成的幫會，有着相同的原因。因為他們變成團體時，比以個人而存在來得更能滿足他們的願望。它提供了友誼、地位、激動和安全的方式，是與青年團提供給幫會孩子者相同的。然而它不同於初級者，乃是鼓舞成員加入犯罪幫會最重要的動機，則是經濟的。他之進入此幫屬關係，乃是因其能由犯罪得到利潤的較確定動機概念所致。

犯罪幫會的一般趨勢，是發展成為純商業性團體，此趨勢是與政府的控制效率有關。這些團體大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一種邊緣的類型，如佛羅里達州 Everglades 地方的 Jesse James 和有名

的 Ashley-Mobley 幫會。此種類型的團體，是剛剛在逾越法律控制的間隙範圍之邊緣和荒野中發展出來的。第二類的例子，可以聖路易的 Ras 幫會和許多當前芝加哥的團體來代表之。他們的生活和被保護，至少在某種範圍而言，是依賴於政治影響力和官吏的縱容。最後的一類，却與公家有連連，因它完全依賴於它的似商業的組織，以及其執行犯罪活動方式的效率。如紐約的 "Cowboy" Testet 幫會，曾被人認為是有史以來有最高組織和商業化的一個匪徒團體。在一九二五年十月裏，使用消音器手槍的案件的人員，即為其大部分的成員。此幫會僱用了珠寶商，以重鑲偷來的珠寶，維持兩家汽車修理廠，以變換和換照偷來的汽車，設有一個批發商和商業公司，以銷售各種贓物，擁有一個還債基金會，以支付保證金和法律罪款。這類型的幫會，因其方法的高超，而表現出不太受到政府的干涉。

十五到二十年前的 Guenilla 幫會，可說是目前芝加哥犯罪團體的原型，它可做為與今日商業性幫會有顯著不同的代表。它通常是由粗魯的打手和亂七八糟者所組成。他們的大多數活動，是定向於維持自己地盤的聲望和地域的管轄權。

「於西邊的某一條街，有三個很有名的名字，出現在早期的幫會史上，他們是 Healeys、Shanleys 及 Canaleys。他們大約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個

，從十八到二十八歲的成員，並在附近擁有某些酒吧為其總部。他們曾擁有一棒球隊，並經營舞廳以賺錢。他們曾因與有名的幫會開戰，以致於引起了政治交涉。在一九〇六到一九一〇年間，他們使用木棍、石頭、短棍和蘇木做武器，一直繼續不斷地進行戰爭。假如有某一集團的人，受到其他團體成員的攻打，則他將可以得回應有的報復；因為他將與同一幫會的其他成員一起再帶回來，以致演變成為街頭大戰。當電影在此地的鄰里地區放映時，那些傢伙使用彈弓發擊使用者。他們大部分是流浪者，有些是罪犯，經常在酒吧附近遊蕩，並從事一些小小的工作。他們兼有政客的有利地位，其中的四或五個人，經常都出現在薪資表冊上，然而他們在爭論中，使用兇器的現象，則是罕見的。」

雖然在芝加哥，大部分的幫會仍然是依賴於大範圍的政治影響力，來繼續他們的營運，然而他們已經顯著地以經濟動機和商業技巧，來取代往昔的冒險利益和擺空架子的方法。而存在於青年幫會和幫會式會社生活中的浪漫成份，在成人幫會中，似乎大部分已經消失。例如 the Hudson Dusters, the Gophers, 紐約市的 the Car Barners, 聖路易市的 Bottoms 幫會以及芝加哥老式 Irish 幫會等等，他們的大部分特質，已經屈從於工業革命裏。